

没有『变虎』，如何『打虎』

——评李修文长篇小说《猛虎下山》

□ 李海言

在遭遇了将近十年的叙事危机之后，李修文通过将这种危机及其背后的内心挣扎可视化的元写作，逐渐消除了语言与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充实与重构，从而努力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都是他对抗沉默失语的精神标本，虽然这一系列的散文创作并不意味着他的叙事危机得以解除，但由言说的困境而至困境的言说，由个体的遭际抵达群体的命运，其中已蕴含着一种弥合个人与社会的鸿沟，捕捉时代共同情绪，追问人的普遍生存境遇的美学意识。长篇小说《猛虎下山》正是这一意识逻辑演化的结果，它的完成可以说也标志着李修文对叙事危机的克服。

《猛虎下山》有着一个“打虎”的叙事外壳，与武松打虎的故事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不过，由于时代语境的变化，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关于英雄的传奇故事，而是一出人性扭曲的现代荒诞剧。小说主人公刘丰收身上不仅没有一点英雄气概，而且还是一个懦弱无能的“怂货”，人到中年，仍然是个钢厂的炉前工，在厂里无足轻重，在家里毫无尊严，面对妻子与工友张红旗的偷情也只能忍气吞声。他上山打虎完全是被逼无奈——产业转型，钢厂改制，在他即将下岗之际，一只猛虎的出现令全厂震动，为了清除虎患，厂方临时决定成立打虎队，谁敢报名谁就能免于下岗，走投无路的刘丰收只好酒后壮着胆进了山。他之所以成为“打虎英雄”，也不是因为他敢于孤身犯险，能徒手打死老虎，而是将自己的白发充作虎毛，谎称与那吊睛白额虎搏斗过。他带领打虎队大张旗鼓地上山打虎，除了被他打压和报复的张红旗扮演的假老虎，就连根老虎毛都没见过。当那个作为钢厂董事长小舅子的导演，要把他们引出真老虎而假扮老虎的事迹拍成纪录片拿去参赛时，打虎这一行动的内涵则被彻底地抽空，刘丰收们生活的残酷性也因被“奇观化”而一并被消解了。如果说武松打虎具有确证英雄本色的实质性内涵，那么刘丰收的打虎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指称。

不过，刘丰收的打虎故事不应简单地看作是对经典人物故事的戏仿。与古典传统对话，揭示古人与今人之间共通的情感与相似的境遇，似乎是李修文多年来写作的一种自觉意识。小说中对戏仿《武松打虎》的反复引用，正是因为戏中人与戏外人具有相互阐发的功能。戏中的武松，自幼做了孤儿，与哥哥相依为命，空有一身武艺而无人赏识，打虎扬名后，也不过是个小小的都头，日日到县衙点卯当差，而后连唯一的至亲也被嫂子害死。戏外的刘丰收也曾是个会写诗、想当作家的人，却为衣食所迫，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人，如果说曾经依附在传统的生产体制中，尽管窝囊无能，但还有做人的尊严，而今却连饭碗都不保。当他深陷困顿，告天地呼父母时，他一定会与那戏中人有惺惺相惜之感：“老天何苦困英雄，叹豪杰不如蓬蒿。不承望云程九万里，只落得沸尘海数千重。俺武松呵，好一似浪迹浮踪，也曾遭鱼虾弄……”武松也好，刘丰收也罢，一样是底层艰难求生的“失意者”，一样是肉骨凡胎的“可怜人”，在有限逼仄的生存空间中，打虎不过是他们融入体制，获得身份认同的一条偶然的路径。

然而，对刘丰收来说，不仅山中是否有虎成了一个疑问，而且打虎的合法性也变得十分可疑，在根本上它既不是出于人们对老虎的恐惧，也并非由强悍的个人力量所赋予，而是依赖于高度一体化的传统生产体制。如

果说三十年前的打虎运动因内在于政治经济的运行逻辑之中，是严肃的正当的，那么在工业化向市场化资本化转型的世纪末，其合法性就在根本上被动摇了。正是如此，这个“打虎”的故事才会最终演变为一个“变虎”的故事。

在组建起自己的打虎队，成为打虎队队长之后，刘丰收深知打虎不成，他又要被打回原形，该下岗的还得下岗，他也明白如果厂长发现山中没有老虎，打虎队同样得就地解散。于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谎言，为了延宕打虎的行动，他现学现用了一套治人的权术，以维护和巩固作为“领导”的绝对权威。其中自然也包含着由长期的卑怯和屈辱激发出来的变态的权力欲，以及某种僭越的心理。他一面拉拢和培植自己的亲信，一面嫉妒和排挤比他聪明能干的杜向东，孤立和报复勾搭他老婆多年的张红旗，试图复刻一个微观的一体化的权力结构。于是，镇虎山上上演了一场触目惊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死搏斗，人性中最野蛮的力量被释放了出来，以至于人人都被反噬，病魔的疯魔，残废的残废，失踪的失踪。张红旗的“病魔”代表着权力碾压下人的极端异化状态。他天生会唱戏演戏，在厂剧团里演了十几年的武松，上了镇虎山后却扮起了老虎，他饿不死，打不倒，越挫越勇，他不仅能学老虎走路跳跃咆哮，还能像老虎一样吞生肉腐肉，不是老虎却胜似老虎，引得宣称“戏比天大”的导演啧啧称赞。然而，他哪里是在演戏，分明是在用毁灭生命、让渡人性的方式进行着反抗，因此，面对导演代表的强势资本及“景观消费”，他终于像老虎一样扑了过去，也像老虎一样在众人的围堵中掉进了陷阱，最后成了植物人。

如果说张红旗的变形属于心灵层面的人性的彻底丧失，那么刘丰收所遭遇的则是身体的变形，由于他始终还保留着人性的一面，还能像人一样思考，因而就显得更加的荒诞。打虎行动被叫停之后，下岗的刘丰收重返镇虎山继续寻找老虎。此时的钢厂已经换了新老板，来了新厂长，为了抓生产、促增效，山中有老虎已经不再重要。那么刘丰收还是信了好兄弟马忠的话，“只有先跟老虎说上话，才能跟领导说上话”，“找到老虎，咱们就是人，找不到老虎，咱们就不是人”。在妻子的支持和鼓舞下，刘丰收下定决心要找到那只老虎。为了引老虎现身，刘丰收穿上了张红旗曾经穿过的那张假老虎皮，穿上后他就不愿脱下了，因为“哪怕睡着了，百兽之中，剩下的九十九种，都要绕道而行，不用开会，不用鼓掌，要多清静自在，就多清静自在”。然而，当他把一只兔子当作所有欺负过他的人给吞吞之后，老虎皮就脱不下来了，从此成了一只真正的老虎。被困在老虎皮里的刘丰收眼看着她因不懈的抗议而遭受凌辱，于是下山现身，终于完成了“打虎”这一行动，只是被打的是自己，打虎队队长则成了自己的儿子。

刘丰收“变虎”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20世纪以后的小说关于社会环境的压迫导致个人异化的叙事，似乎总摆脱不了这位现代派鼻祖的影响，特别是因为李修文在小说中运用隐喻、象征、寓言、反讽等手法对权力的批判、对人的荒诞处境的思考，与卡夫卡有相通之处。但我国传统的叙事资源显然能够为小说的阐释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人变虎的故事，在我国志怪和传奇小说中并不少见，《太平广记》就记载了数十个，如《黄苗》中有黄苗被庙神惩罚吃生肉变为老虎的细节；《僧虎》中有僧人得一虎皮，“戏被于身，摇头掉尾，颇克肖之”，“忽一日被之，

觉其衣黏着肤体，及伏草中良久，遂不能脱”的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多半以人变虎作为惩罚手段宣传“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只是在细节上与《猛虎下山》有诸多相似之处。刘丰收以虎身拯救妻儿，成就下岗工友们的“打虎”行动，最终完成自我救赎，倒是与蒲松龄的《促织》在精神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李修文并没有直接将这些故事中汲取创作灵感，但实际上，他也在无意中接通了这个伟大的叙事传统，从而丰富了文学对于现实的想象力和表现力。

回归传统，本来就是李修文多年来创作的自觉追求，但如何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相互阐发与双向建构，才是更有价值也更艰难的事情。李修文曾经是以先锋的姿态闯入文坛的，这种先锋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故事的戏仿，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进行着互文性的写作，但如果缺乏个体生存的独特点，那只能成为一种向壁虚构的纸上游戏，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后来会中断写作，陷入失语的困境。而《猛虎下山》正是在他因失语而陷入生存的深渊后，在艰难求生中通过不断充实自我，最终找到融合传统故事与现代经验路径的标志。小说借用传统“打虎”和“变虎”的叙事框架，揭示了社会转型期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困境和普遍心理，也在当代生活的土壤中激活了传统的叙事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猛虎下山》可以看作是李修文走出写作困境、克服叙事危机的一部元小说。写作何尝不是一种“打虎”？不遭遇屈辱，不经历哀号，不陷入疯魔，不把自己变为猛虎，如何才能实现自我的救赎？

(作者系湖北省品牌发展研究中心[文华学院]研究员)

一个夜晚

(外一首)

□ 郑诗棋

我的脚下流着倦倦的街
发端坐着疏疏的星
白日里曳着
慧尾一般长痕的鸟儿
——就当它是只
雀跃的鸟儿罢
早已远去，更远去
玻璃中暂住的金色晚照
也只许窗框留它片刻

我走过那发颤的春水
水里淌着摇曳的月
我的心儿也在发颤啊
颤着掬起一捧月亮
垂下眼想它
近了，更近了——
月亮也跟着颤，颤得碎了
于是我只得吻了吻
这不算太温柔的夜晚
温柔地吻

我的梦和我的雪夜

你总是说，我还有梦。
我会在金色的海上唱歌，
在蝴蝶的翅膀上写诗；
我会喝下云酿成的药水，
飞过昨夜，飞往明天。

你总是说，我还有爱。
我会永远在火光中流泪，
在玫瑰的怀抱里安睡；
我会在星星的肚皮上跳舞，
不问来处，不问归途。

我的灵魂入夜了。
有时候吐出滚烫的泪珠，
然后寂静，然后失温。
有时候丢掉轻盈的翅膀，
然后下坠，然后失落。
一瞬间的梦，下一瞬是爱，
再下一瞬是夜晚，
我的灵魂下雪了。

雪淹没诗句，淹没时间，
淹没具象的我。
我的梦和我的爱
搅成一团，在雪里打滚。
我现在有混乱和混乱的我，
混乱的我的梦和我的爱，
躺在露水上睡着了，
等待明天的太阳带来的
下一个瞬间。

麦子黄了

□ 蒋志华

麦子黄了。金黄，壮美！

我下乡时，车子穿过一片麦浪，田里几乎看不到人，只见几台庞然大物的联合收割机来回齐刷刷的穿梭作业，车屁股立即喷吐黄灿灿的麦粒儿，可以打捆、灭茬……

这丰收的果实来得实在太快，农民不再受劳力之苦。时代进步庆幸之极，但心里又生发几许感慨：可能汗流浹背换来的馒头最香，难以忘怀小时候参与大人们一起抢收的情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到田户才几年，在一个村子里能拥有简单的农业机械一两件，那算是居住在跟前块头的人家之福。记得父亲最早把村集体一个笨重的“死”动力机买过来了，方便自家打米，同时服务左邻右舍收点钱，补贴家用。特别是打麦子（机脱麦子），需要的人多，还要抢晴日，我们姊妹仨都在上学，因为缺劳力，父亲说有了这个“死动力”，再买个二手的旧脱粒机吧，万一请不到人帮忙，方便自家慢慢打。印象中这脱粒机和那个动力机在我住的那场屋里红火了好多年。每逢打麦子那一季，几个棒小伙把这两个“笨机械”抬上抬下。

打麦子的，是一场隆重的集会。脱粒机机口是“喂”麦子进机脱穗的地方，“喂麦子”有讲究。首先摆铺递过来的麦子要厚薄适度，紧接推进机口的瞬间要安全匀速，悟性要强。说有悟性，是因弄不好把手“喂”进去，真“失手”，会出大事故的，所以这个岗很关键，得一个能手，父亲多数是这个角色。配合服务父亲的还有两三个劳力，并排站在机口搭建的案板递传已打散的麦捆。脱粒机脱出的麦粒就在机脚下边，得一个人不断地用木掀铲往一边堆积。

一旦机器轰鸣，整个打麦场赛若战场，至少还得五六个劳力，用杨杈及时把脱出来的麦草杈到堆麦草垛的地方。两人迎面一组，配合着杈麦草，抖上几抖，让麦粒离草落地。不然麦粒夹到麦草里堆成垛，烟成粪啦，辛苦了一季的汗水白流了。“喂”进脱粒机的麦子吞吐出来麦草灰尘飞扬，直呛人鼻。那时遇农忙，村小学校放假一周，老师多是民办老师和临时代课老师，家里有田也得收割，同时要求学生回家也帮大人做点农事。上十岁的我，就这样也混在其中力所能及。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左邻右舍往往腾出手来相互帮忙，每家几亩田的麦子几乎前后收割完毕，都要趁响晴的日子脱粒归仓。因为麦子最怕雨淋，不仅减产，而且麦粒发霉生芽，磨出的面粉黏牙发酸就吃不成了。记得忙碌时，我们住的那一湾八九户人家一天要打好几场麦。如果预报次日有雨，晚上在道场上挂两个

上九宫山

□ 赵卷卷

小时候，一声“上街去”“上城了”“上游乐场”的吆喝，如同缤纷的糖果，吸引着我欢快地追随家人的脚步，去感受那份独特的甜蜜。而后，一句“上台领奖”“上馆子”“上影院”的欢呼，如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成长路上无数的梦想。简单而纯粹，蕴藏着多少欢声笑语呵。

本应该和同事一起去外地团建，电话里“上九宫山”三个字似一阵清风吹过耳畔，随即化身成一只轻盈的鸟儿，从树梢展翅高飞，一刹那的绚烂飞舞，比晨曦中的阳光还热烈，突然点燃了我心中久违的期待。

微雨中，我们踏上了通往九宫山的旅途。和风，添上细雨，丝丝扣扣，为行程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韵味。抵达此行的驻地中港村时，阳光已洒满大地，漫步在碧草茵茵的石板路上，一步步聆听着乡间的跫音，细细碎碎，却也是侧耳倾听，生怕错过了那厚厚的传说与故事。

行至村头，遇见一群精神矍铄的老人。最显眼的莫过于一位年近八旬的大爷，身着蓝色衬衣与卡其色裤子，笔挺地站着，时不时挥舞几下手臂，和坐在门前的七八位同龄老人交谈甚欢。许是常年迎客的缘故，许是他也正聊到开心处，只见他蓦地转身，面对着我们，唱起了熟悉的歌谣：“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歌声悠扬，宛如山谷回音，清澈明亮。我们纷纷举起手机，一边拍着视频，一边驻足欣赏着。一曲终了，同行有人大声赞其为“小村歌王”，他的脸上竟泛起拘谨而羞涩的绯红，之后又兴致高昂地为们清唱了两首山歌。

通山包坨

□ 易飞

簸箕藏起，像落下片片热泪
被砸中，浑身颤抖
那堆被捶胸的岩粉愣愣
让她们膨胀，身子发热
是谁在蒸锅里放了催情的佐料
令她们难以坐怀
但春夏之交九宫山万物松动
傻乎乎的像群煤矿工人
自称红薯实为黑大个
她们一向不搭理
在滚动中展示美妙的身姿
总有成为香芋的那天
但先沾圆润黄里透白的芋头
出山时才见天日
同样结实，朴素
同样躬身在底层
它们也算门当户对
像男人吧唧吧唧的甜话
铝锅里咕嘟咕嘟冒气
出锅后迫不及待
中港村的芋头是滚烫的



《五月的鲜花》(油画) 段义芳 作